

1921.7 - 1937.7

□王健英 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



大事纪实

(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21.7 - 1937.7

□王健英 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

大事纪实

(三)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三二年

1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称“全中国的民众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指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一切罪恶的制造者”，“一切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提出“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只有打倒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才能真正举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

1月初

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聂荣臻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1月2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批示，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改为长沙中心市委员会。委员张友生、徐少保、文学礼、李绍庸。书记张友生。

1月4日

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毛泽东找何长工谈话：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原国民党辽宁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于上年11月将辽西各义勇军统一组织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本日，黄显声在辽宁省北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与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建立联系，受到全国各地抗日救国团体的声援与支持。

1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号召“创造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此宣言较1日发表之主张明确将抗日摆在首位。但仍号召“武装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

1月7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听取书记周恩来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经过讨论，同意周的报告，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认为中央苏区“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但着重指出“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严肃批评“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决议提出“苏维埃政府应颁布处理反革命犯条例和加入反革命分子自首自新条例”。“国家政治保卫局……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之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红军中亦须建立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工作。保卫局的组织纲要，应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之”。

1月8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加强对互济会的领导致各级党部信》。指出“互济会是最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之一，是党夺取和教育大多数劳苦群众的组织之一”。要求“在各级党部中应有一人专门负责领导互济会的工作，并须在互济会中成立党团的组织，经过党团去切实领导全个互济会组织的工作。同时，今后党团员及工会会员，应尽可能的加入互济会”，“领导互济会公开或

半公开成立各种惨案后援会，筹备广大的群众会议追悼革命战士及组织群众去救济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如反帝战士、罢工工人、斗争的灾民……）”。

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出《关于裁减空闲多余人员送交军委的训令》。要求各部队指挥机关要严格地裁减空闲人员，多余者务于20日以前送军委，以便适当分配工作。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在苏区党“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决议虽然批评“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但仍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明确指示中央红军应“首取赣州”。决议仍强调“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同时也提到不能放松反对“左”的倾向危险，“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

中革军委发表通令：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设之军事部取消，改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江西军区。以陈毅任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所有独立第二、三、四、五、六师及地方武装，统归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指挥。

1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开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攻打赣州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赣州三面环水，红军装备技术差，敌军必坚守，恐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只能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硬攻赣州。但与会多数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为将中央区与湘赣边连成一片，主张攻打赣州。周恩来在了解中央苏区与红军实际情况后，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目前中央苏区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电复：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取。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到陕西省合水县柴桥村传达省委决定，将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称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政治处主任高维翰。中共军事委员会书记谢子长。下辖第一、第二支队。

1月10日

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规定中央苏区的红军目前任务：“坚决的取得苏区邻近较大城市——赣州。”作出“本期工作中的军事部署：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下辖：攻城部队，围攻军为第七军、第二师及坑道队、爆破队、炮兵队。总预备队为第一师；监视部队为红一军团十二师；地方工作部队为第三师与红一军团其他三个师。“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指挥，下辖军区各独立师和河西湘赣省独一师。

1月10日至20日

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举行。到会代表326人，大会讨论通过了政治、组织、红军、反帝、白区工作、青年工作、职工运动等决议。选举出正式的鄂豫皖省委，正式委员31人，候补委员11人，监察委员九人，候补委员四人。推选省委常委：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成仿吾、郑位三、汪友清、耿显义。书记沈泽民，组织部部长高敬亭，代部长

周纯全，宣传部部长成仿吾，妇女部部长汪友清，军事部部长徐以新。省委下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个特委，不久特委改称道委。

1月11日

中革军委发出通令，任命袁国平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裁判所所长，张云逸、宋裕和为最高裁判所委员。

1月12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指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AB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实是不足奇怪的”，强调“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必须用很大的决心，成立政治保卫处，有计划的与有组织的同这种反革命团体做斗争”。同时提出“我们绝对要防止夸大这些反革命团体的力量”，“不能把党内”消极怠工分子、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分子“都看做是反革命团体的分子”。

1月14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二月二十五号失业工人运动日的决议》。提出“组织日厂的失业工人的斗争”，“广泛的组织失业工人的反日会，公开的活动”。但要求“组织群众包围反日会，提出全部救国基金和日货，来维持生活”，“捣毁黄色工会”等“左”的做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常会，由毛泽东主持。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央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任命何叔衡为主任；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江西省苏政府提出的没收和分配土地办法；批准瑞金县苏政府撤销主席黄正职务等。

1月15日至2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举行，到会代表200余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致开幕词。中

共苏区中央局代表毛泽东，临时中央政府代表项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致词。大会选出 19 人组成主席团。顾作霖作了苏区中央局工作报告。大会经过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团的建设问题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顾作霖任书记，张爱萍任秘书长，胡望鹤任组织部部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部长，杨兰英任青妇部部长，萧维杰任儿童局书记。列宁团校校长顾作霖兼，副校长杨岳彬。

1 月中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开会。由毛泽东报告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略，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有的委员不同意这种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发生争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

1 月 19 日

任弼时与陈毅向周恩来等汇报出席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苏区中央局经讨论作出决议，要求江西省委：“积极向外扩大革命战争，发展苏维埃区域”，“首先要努力在目前去取得一二个较大的城市，使苏区打成一片，以更巩固地开展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局面”。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出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信。明确“自红军党的组织改变后（指取消党委制）政治部即是党的领导机关（政委是党的领导者）”。“党务委员会只管批准新党员，决定处罚党员及解决党的纠纷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政治部决不能忽视党的工作或放松对党工作的领导”。

1月21日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创刊。主编张闻天。第1期卷头语称：由于《红旗周刊》印刷困难不能按期出版，《斗争》是《红旗周报》附刊的替身，党内问题在此开展讨论。

苏区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任弼时、朱德、陆定一在大会讲话。大会听取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选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执行委员13人。推选王盛荣为总队长，周恩来兼任党代表，张爱萍兼任参谋长。

1月22日至29日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湖北监利县周老咀举行。出席代表127人。主席团委员九人。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作政治报告，讨论时受到大多数代表批评，夏曦处境孤立。24日，中共“临时中央”派关向应、尉士筠到会。传达中央指示，明确支持夏曦，指责万涛等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大会接受了政治报告，通过了政治任务、土地、经济、财政、职工运动等决议。选出了湘鄂西省委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六人，监察委员九人。推选常委：书记杨光华，组织部部长杨成林，宣传部部长万涛，妇委书记张孝桂，共青团省委书记宋盘铭。

1月23日

中革军委发出组织抚恤委员会的训令，“专司抚恤伤亡，残疾的任务”，委任贺诚、杨立三、滕代远、李景文、陈志方为委员，贺诚为主任。28日，军委又训令各军组织抚恤分会，隶属军委抚恤委员会。

1月24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出席，并汇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情况。指出日本纱厂罢工是关键，必须坚持到底，才可能取得胜利。28日下午4时，因密获日军将采取行动，上海30余家日商纱厂全部宣布关厂停业。

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常会。由副主席项英主持。讨论决定：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训令；红军选举细则；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议决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调方维夏为教育委员会委员，总务厅厅长由刘开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因病请假期间，其职务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何叔衡兼任等。此后，红军总政治部成为同中革军委并行的机构，归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直接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红军中的工作机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是一贯的垂直系统”；“在各省苏维埃政府与中央军委中有它的代表机关”，“省县两级设分局”，“在红军中中央军委或其他苏区军委会及军团或军（或师）两级均设分局与委员会。县及军（或师）以下则设特派员”，“亦得在某种机关中直接派遣特派员”。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准备“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提出党“应在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与“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中心口号之下，进行最广大的运动”。要求“革命的反日组织与罢工委员会及工会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来进行组织工人的义勇军与纠察队”，“组织近郊农民及失业工人……领导他们夺取武装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但

仍把“举行兵士与民众的大联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摆在首位。

1月28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各军组织抚恤委员会的训令。规定“各军亦应有同样组织，定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第×军分会，委员五人，由各军政治部、参谋处、军医处、经理处分派”。各军分会的工作，归军委抚恤委员会领导。

晚11时，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以护侨为名，致函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强令中国军队退出闸北。半小时后，日本侵略军突然进攻闸北。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要求的影响下，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奋起抗战。该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星夜步行至真如车站，设临时指挥部，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史称为“一·二八事变”。

1月29日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布《关于红军中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组织说明与工作大纲》。规定“由总政治部召集红军各部队代表会议选举委员7人至9人组织反帝总会”。“红军各部队只需要军与团两级组织”，“江西军区亦得建立”。随后总政治部召开会议，选出中国工农红军总直属队反帝大同盟总会，推选原红七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霁民为主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发表宣言：号召上海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号召十九路军兵士和巡捕、警士与民众联合起来，反抗卖国长官的命令，把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次日，上海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余工人组织起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各界人民开展广泛的捐献运动和支前运动。

1月3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号召“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进攻!”“要求立即撤退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没收日货给工人失业工人与难民!”仍强调“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本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工人义勇军20队约千人,到前线协助十九路军挖战壕、搞运输、救护等。另组织18个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募捐。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发起捐制棉衣,五天内制成3万余套送给前线十九路军官兵。

1月下旬

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到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他关心国内政局变动与苏区斗争形势的发展。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初稿。

1月

中共满洲省委在书记罗登贤主持下,在哈尔滨制定出《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动地组织义勇军自动地武装起来,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布《总政治部通令》称:“倾奉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三号内开‘为改正政治部名称事:政治部是代表政府在红军中领导和指挥政治工作的机关,他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并不单纯的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过去的名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是不适合于这一组织的意义的。因此,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议决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其他各级政治部一律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某军某师政治部,望立即依照此命令执行,此令。’奉此,通令各级政治部一律遵照为要”。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成立闽西（福建）军区。20日，于福建长汀县十里铺正式成立福建军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谭政，经理部部长毛泽民，军医处处长张令彬。下辖红十二军，独立第七师。3月，先后成立了抗岩永、汀清连、宁清归三个军分区。

根据中革军委1月9日命令，江西军区总指挥部在江西兴国县城正式成立。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陈毅兼，参谋长谢维俊，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卫生部部长余永安。下辖独立第三、四、五、六师。同年秋设立了第一、二、三、四、五军分区。

2月初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成立了湘赣军区总指挥部，驻江西永新。总指挥张启龙，政治委员甘泗淇，副总指挥李天柱，参谋长杨茂，政治部主任李朴。经理部部长许容光，卫生部部长谭农。下辖：红军独立第一、三师。后成立第一、二、三、四军分区。

2月2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共8条。重申“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上海设立中立区！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自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否认一切外债与赔款！”

2月3日

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冯雪峰、胡愈之、陈望道、丁玲、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斥责国民党不抵抗主义。7日，鲁迅、茅盾、胡愈之等129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红色中华》“二七增刊”刊登周恩来《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指出：“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要以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为反帝

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全中国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直接对日作战”。同时提出苏区“更应积极的向外发展，开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首先是夺取赣州”。

2月4日

中革军委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包围赣州。红七军等攻占城东南华林寺高墩龙高地。敌军全部退入城内，构筑工事，准备固守等待援军。

2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常会，由副主席项英主持。会议决定江西省苏政府主席团暂不设立；议决中革军委今后须作一定之特费预算；议决在人民委员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可召集各部门负责同志会议，解决各项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瑞金发布《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的通令：“兹特命令颁布施行，凡红军各级机关须切实的遵照执行为要”。通令附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制表》、《总政治部组织系统表》、《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组织系统表》。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制表》规定：设主任一，“在中共中央指示之下，管理全国红色海陆空军政治委员、政治部，计划和实施军队中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副主任一，秘书处一；宣传鼓动部部长一；组织部部长一；青年工作部部长一；党务委员会书记一，“负责召集党务委员会及处理日常事宜”；“红色战士通讯处处长一”。共约21人，马八匹（部长以上骑），长枪99枝。

《总政治部组织系统表》规定：主任、副主任之下秘书处下有文书科、收发科、印刷科、事务科、政工连；宣传鼓动部下有宣传鼓动科、训练教育科、编辑出版科、文化运动委员会；组织调查部下有组织科、调查统计科；青年工作部；党务委员会；红色战士通讯处下有《红星》报、《红星》画报。

2月7日至13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持，在瑞金叶坪召开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250 人。由 21 人组成主席团，有陈寿昌、蔡树藩、梁广、张思坦、邓振询、倪志侠等。名誉主席 15 人，有卢福坦、周恩来、毛泽东、项英、朱德、刘少奇等。由全总苏区执行局主任陈寿昌致开会词。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临时中央政府代表项英，中革军委代表叶剑英，共青团代表顾作霖，红军总政治部代表李卓然等先后致词祝贺。会议讨论并通过有关决议。大会分别选举成立了闽、赣两省职工联合会。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 13 人，委员长张思坦。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 15 人，委员长刘启耀。

2月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认为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决战中“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提出必须立刻执行的紧急任务：“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要求“对于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务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在延吉县小城子成立，王德林任总指挥，中共党员李延禄任总部参谋长兼第一补充团团长。2月中下旬，王德林部先后攻克敦化、额穆、蛟河等县城，打击日军与伪军。

2月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在江西瑞金创刊，主编王稼祥。第 1 期刊出周恩来撰写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党的中心紧急任务是要以民

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

2月上旬

红三军政治委员由关向应担任，军长仍贺龙。下辖第七师与第九师。此时将原红九师二十五团与鄂西北独立团合编，重新成立红八师，师长段玉林，政治委员屈登高。

2月10日

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下，自1月9日开始进行商（城）潢（川）战役，于本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师等5000人，缴枪2000余枝。在豆腐店方面军以10个团击溃敌19个团。解放了商潢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攻占商城。

2月11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信》。要求应“彻底转变”，“狭隘的秘密工作方式”，“抓紧目前日本强盗不断扩大对华军事行动……的严重事变，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组织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宣传队、讲演队、募捐队、纠察队、义勇军、突击队等，公开地到马路、工厂、作坊、学校、兵营、近郊农村中去”。提出“准备在今年‘五卅’纪念节召集全国的反日反帝大会，以成立全国的组织”。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指示中共必须用一切力量打入军队，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到军队去争取士兵群众夺取军队；在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建立以工人为核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的任务是号召与领导反帝的士兵作战并加紧宣传鼓动，逮捕军官和卖国贼；采取这种路线，如得到工农和士兵真正响应，则可创造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起来推翻南京政府，宣布自己是中国政权的领导者。这一指示基本方面是“左”倾的。

2月12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国际来电与当前工作。本日发出《关于组织工作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认为四

中全会党实行了工作转变。(二)列举布尔塞维克化的成就：“巩固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洗刷了许多异己或不坚定分子，引进了许多新的积极干部”；“实行缩小机关党到群众中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肃清过去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巡视制度的建立与改造，以及中央分局、全权代表、特派员的创立”；“注重于‘领导机关工人化’与‘提拔工农干部’两个口号之执行”；“注重于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与贫雇农的基础和洗刷一切不良分子”，“建立产业支部与支部须有政治生活”等。(三)对于苏区党组织，认为中央区“中央局的加强，自然有新的现象”；“湘赣边……省委的领导是相当的巩固的”；闽粤赣“因为肃反工作的错误，影响了全盘工作”；赣东北“两条路线斗争还是非常不充分，特别是至今没有切实的肃反工作”；湘鄂赣“领导机关大半为富农官僚分子所把持”，“地方党部的工作也是一塌糊涂……还没有真正开始转变”；湘鄂西分局“的确做了许多工作”，“在政治领导上，自然没有离开中央的路线”，“一切反党分子遂乘机进攻分局，最近在中央指示下，已正在解决这些问题”。“鄂豫皖在党的建设上是算苏区最好的了……改造和巩固党的领导，坚决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洗刷富农和不良分子，并相当做了一些培养干部的工作”。认为苏区的群众组织“目前最好的是鄂豫皖”。并吹嘘中央“注意苏区问题”，“的确有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建立中央局和分局的领导以及改造其他区域党的工作，中央为此曾前后派了三四百个干部到苏区去”。(四)对于白区党组织，分别对江苏、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满洲、安徽、浙江、福建、两广、四川、云南、长沙等省委四中全会后的组织变动与活动概况作了叙述。(五)对群众斗争的组织工作，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组织工作，是落在群众斗争发展之后的”。“工会除苏区外，全国会员估计不过三千人”；“全国团员可统计者约在十万左右，而白区不到十分之二”。(六)中央“组织局的成立不过两个月”。由于人员少，“没有很多时间研究全国组织状况，所管理